

【古代文学研究】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

——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刘玉叶

摘要: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关键词:南朝梁末;入北文人;忏悔;庾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1—0178—03

南朝梁末文人因为变乱大量入北,著名的文人有庾信、王褒、徐陵、颜之推、沈炯、萧祗、荀仲举、江旰、宗懔、殷不害、薛道衡、萧放等,他们大多到北朝继续入仕,而且官位显赫。但是身为贰臣的忏悔和对南方故乡的思念一直在折磨着他们的身心。遭受了更加铭心刻骨的家国之痛,忏悔之感也更加强烈,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使这些原本过着优游庸俗生活的文人,晚年作品气贯凌霄,情动江关。

南朝贵族文人在侯景之乱以前,大都出自“平流进取,坐致公卿”^①的世家大族,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正如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所描绘,“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吴敞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②长久的和平使这些南朝士大夫完全丧失了忧患意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沉痛地总结,士大夫们“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出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黯黯,江湖潜沸”。而一旦大敌当前,“公卿在位及间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史书记载“侯景陷建业,朝士并被拘禁”,“京师络绎,无不附逆”,大量丝毫没有反抗意识与反抗能力的文人被掳到了北方。

被掳到北朝的文人们,面对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之痛,却大部分在北朝继续任职,服侍新主,可谓“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他们的这种行为深为后人所不齿,清代赵翼《陔余丛

考》便评价他们“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直接指出“齐、梁以来,视易君如弈棋,士鲜知节义。”对于最有忏悔精神的庾信,因为其声名显赫,而历经“四朝十帝”,清人宋大樽《茗香诗论》中评为“女事二夫,男仕二姓,尚何言乎”,全祖望则直斥其为“无耻”。

确实,南朝文人对于改朝换代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南齐书》史臣便评价当时的文人心态:

“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出身世家的贵族们都为了自身家族利益考虑,对君臣名义非常淡漠,《晋书》史臣评论,“夫五运攸革,三微数尽,犹高秋凋候,理之自然。观其摇落,人有为之流涟者也。”对于山河易姓,他们心中往往只有淡淡的哀伤,但更重视的是“全身保性”(《颜氏家训·养生》)。佛教的无常思想,也让他们对朝代更替看的淡然“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颜氏家训·文章》),他们更加理性地关注自身的命运“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颜氏家训·勉学》)。

虽然当时世风如此,但是不能说当时的士人都已经完全

收稿日期:2011—09—20

作者简介:刘玉叶,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丧失了儒家道德的约束,侯景之乱对于这些“莫见兵甲”、“肤脆骨柔”的南朝文人而言,莫过于“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是天崩地裂一般的打击。以至“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繁华的江南瞬间成为人间地狱,许多文人都深刻记录了这一灾难对自己带来的强烈的心理震撼。血淋淋的现实唤醒了他们,正是这种巨大的震惊作为心理基础,才能促使他们脱离以前只关注自我与家族利益的狭小视角,去进一步地思考与反省。

在这样的战乱中,他们也家破人亡,沈炯忏悔“余技逆而效从,遂妻诛而子害”,“稚子夭于郑谷”,庾信《伤心赋》也说“侯景之乱,二男一女相继亡没。”颜之推更细致描写了人间地狱般的战后惨景,在《观我生赋》中云“野萧条以横骨,邑闻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剪焉。”自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他看到百姓受难,尸体遍野,十室九空,也不禁“怜婴童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倍于涂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转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黔丧,揜桐棺之稿葬。”沈炯则为祖国遭受如此灾难而指天怨地,在《归魂赋》中愤恨呼号“我国家之沸腾,我天下之匡复。我何辜于上玄,我何负于邻睦。背盟书而我欺,图信神而我戮。”正因为太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他们心理上的震惊是无可比拟的。

但是庾信、颜之推等有反省意识的南朝文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惨痛的回忆之中,而是自觉地反省了梁代覆灭的原因。文臣武将懈怠渎职,皇家宗室自相残杀,使梁代的灭亡成为理所当然。而这些文人,他们何尝又不是那些尸位素餐、昏庸懈怠大臣中的一份子呢?庾信本传记载,“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作为简文帝信任的保卫宫廷的最后一道防线,软弱的庾信竟然大敌当前,临阵脱逃,梁代的覆灭他们是难以逃避责任的。梁代宗室萧誉就惭愧于自己决策失误,没能力挽狂澜而“恨少生而怯弱”,在《愍时赋》中“悲晋玺之迁赵,痛汉鼎之移新。无田、范之明略,愧夷、齐之得仁”,他“耻威略不振,常怀愤簿”,后“以忧愤发背而死”。因为他们自己的种种过失,而造成国家覆亡、百姓生灵涂炭、妻子儿女死去,他们心中才会产生这样深刻的忏悔而无计消除。

虽然被后人批判,但是庾信确实是这批南朝文人中最具有忏悔精神的一位。这场变乱使庾信的人生发生急转,从此留在北方。这种忏悔的痛苦使庾信扭转了早期浮靡艳丽的宫体文风,而是“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他常常用忏悔精神来鞭策自己,自述有“三十六水变,四十九条非”(《谨赠司寇淮南公》),他对自己的贰臣行为是难以容忍的,认为自己的失节就如“苦李无人摘,秋瓜不值钱”(《归田》)、“甘蕉自长,故知无节”(《拟连珠》二十八中)。自己的失足行为已经完全让自己丧失了作为儒家士大

夫的名誉和价值“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拟连珠》二十二)。宁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楚囚”钟仪、痛哭秦庭的申包胥和充满英雄气概为国而死的荆轲都常被他用来自和自己进行对比,他回忆起他们“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哀江南赋》)的事迹,向往“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哀江南赋》)的悲壮场面,想起自己“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枯树赋》),而对自己的“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惭愧备至。越是这种对比,越是加重了他的耻辱感,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拟咏怀》二十)这种耻辱使他内心“不能安”,虽然表面在北朝风光做官,但是却是虚与委蛇,内心的苦痛也只能伪装而不能直接表现。庾信也试着劝慰自己,从痛苦的忏悔中摆脱出来而不要再顾及自己的名节,“身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十一),“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拟咏怀》其五)但这显然对减轻庾信的忏悔感是无济于事的。他日夜盼望能见到来自南方的故人,感叹“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以至“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其七),但是身为北朝重臣,一旦见到故人会令他更加愧疚,“故人悦相访,知余已挂珪。”(《对宴齐使》)“寄言旧相识,知余生入关”(《反命河朔始入武州》),“故人相借问,平生如所闻”(《集周公处联句》)。这种忏悔之下的折磨,使庾信常常自比为一棵“生意尽矣”的枯树,一棵半死的梧桐,“是以譬之交让,实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虽残生而犹死”(《拟连珠》)。

除了庾信之外,其他入北文人也存在同样的忏悔。颜之推常沉浸在自省之中,“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观我生赋》),自述“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颜氏家训·序致》)。自惭于“一生而三化”、“终荷戟以入秦”感到“愧无所而容身”,他在《观我生赋》中忏悔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吠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朴素,莱封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从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悔不该读书有才华,幻想如果自己没有文才,也就可以“安贫乐贱”,人格就不会被玷污了。王褒也有同样的悔恨,《颜氏家训·杂艺》云“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刘璠《雪赋》把自己比作已经被污染如淤泥的雪“无复垂露与云合,唯有变白作泥尘”。在胡人统治下的北朝,当年在南朝身为贵族的文人也不免要卑躬屈膝,沈炯《归魂赋》中悲愤地说“蛮蜴之与荆吴,玄狄之与羌胡。言语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叠足敛手,低眉曲躬。岂论生平与意气,止望首丘于南风”,回忆起当年,“受北狄之奉书,礼东夷之献使。实不尝至屈膝逊言,以殊方降意。”

因为忏悔之意与望乡之情,许多南朝文人在北朝也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如沈炯在魏“闭门却扫,无所交游,时有文章,随即毁弃,不令流布”,偶有流布也多是“陈己思归之意”,宗懔“才辞干局,见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预政事,岂亡国俘虏不与图存者乎?”他们希望能够归隐,但无奈“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遁”(《颜氏家训·终制》),他们只能用文学来排遣自己的痛苦。正是这样,和他们有同样遭遇的李陵,被庾信等人引为异代知音。李陵的《答苏武书》虽很有可能为后人所作,但可谓替庾信道尽心中痛苦。对于习惯南方生活的人而言,北国环境非常恶劣,“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这种强烈的孤独感庾信也是亲身体会,辱没名誉的忏悔感更是同病相怜。儒家正统的华夷观念对这种胡族都相当歧视,为胡族做官效力是一件非常令人不齿的事情。李陵出身名门,这种辱没家风的忏悔感情才如此强烈,而庾信等南朝文人大多出自文化贵族,往往对自身家世非常自豪,庾信就在《哀江南赋》中称颂家风“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祖父庾易“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父亲肩吾为“隆生世德,载延贞臣”,越是自豪于自己的家族门风,就越是对“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这种耻辱而忏悔不已,这种耻辱使他们只能隐忍苟活,而如枯树般失去了灵魂,如徐陵《与王僧辩书》中所说那样,已是“游魂已谢,非复全生;余息空留,非为全死。同冰鱼之不绝,似蛰虫之犹苏。”

除了家族因素,北方的陌生环境和落后的文化也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孤独感,成为了如韩延之《赠中尉李彪诗》所写的失旅之鸿“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从。痛哭去旧国,衔泪屈新邦。哀哉无援民,嗽然失旅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庾信等南方文人早已适应了温暖湿润、繁花锦簇的江南风光,北方的山水让庾信常常回忆起少年在江南的漫游,感觉“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小园赋》)。当时南方士人也普遍鄙夷北朝文化,“号洛阳为荒土”(《洛阳伽蓝记》卷二),颜之推称“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狠拙甚于江南”(《颜氏家训·杂艺》)。庾信更是指斥北方文坛“驴鸣犬吠,聒耳而已”。还有逸闻称“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北朝文坛领袖魏收被徐陵鄙视至此,可见北方文坛在南朝文人心中之地位,当自己成为北方文坛的一员之后,这种难逢知音的文化的孤独感可想而知。庾信、王褒等文人在北朝受到优厚的待遇,其本传记载,“世宗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滕王宇文邕为庾信的文集作《序》,称其“才

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并称“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缱绻,契比金兰”。但是庾信与这些北朝贵族的交往是“面热心寒”,他们很难说得上是庾信的真正知音,王褒也是每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而已。北朝文人普遍是带着自卑感仰视庾信等文豪的,虽争先“学庾信体”,但都没有了解庾信文章真正价值所在,而是仍旧崇尚庾信早年的华靡文风。滕王序中着重赞美的是庾信文章的“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强调的是文学“弘孝敬,叙人伦,移风俗,化天下”的教化功能,也许是身为北朝贵族而不愿承认,根本没有提及庾信因为忏悔之情与乡关之思而“老更成”的文学。这种环境上、身份上、文化上的孤独感,又因为他们的忏悔情绪而加重,使南朝文人有时不知“茫茫宇宙,容身何所”。他们日夜“瞻望乡关”,沈炯长时期被战乱的心理阴影困扰,“思我亲戚之颜貌,寄梦寐而魂求。察故乡之安否,但望斗而观牛。稚子天于郑谷,勉励愧乎延州。闻爱妾之长叫,引寒风而入揪。何精灵以堪此,乃纵酒以陶忧”,灵魂已不堪折磨,只能纵酒忘记那些记忆,因为孤独无人能诉,以至于向五百年前的汉武帝上表,哭诉“羁旅缘臣,能不落泪!昔承明既厌,严助东归;驷马可乘,长卿西返”,希望放严助东归、司马相如西返的汉武帝也能冥冥中帮助他返回故乡。对于一生没能回到故乡的庾信来说,“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拟连珠》)。“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拟咏怀》其十),等等。最后作为北周的臣子被记载进《周书》,真正失去了自己的故乡。

对于自己的失节行为,颜之推曾无奈地辩解说“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颜氏家训·文章篇》)刘琨《雪赋》也说“而乃凭集异区,遭随所适。遇物沦形,触途湮迹。何净秽之可分,岂高卑之能择。”这些文人只有生死的选择,而没有主宰命运的权利,他们一切依靠人主,如果没有舍身勇气,也只能生活在终生的忏悔之中。但是最具有忏悔意识的庾信,就把这种宗教式的忏悔带来的灵魂剧烈的冲突和痛苦融入了文字之中,其自我反省的自觉和深度,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他“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文字所蕴含的令人动容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他忏悔精神赋予他痛苦之外的礼物。

注释

- ①(梁)萧子显《南齐书·褚渊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24页。
- ②(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2006年。

责任编辑:行 健